

我们研究人口学是以经济为核心的

孙敬之

此文原为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孙敬之教授1980年10月于国际人口学家北京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本刊发表前又经作者做了一些补充。

人口学和人口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联系到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一切方面。因为，人即属于社会，又属于自然，人的个体是自然的，人的集体却是社会的。任何个人，尤其是在文化很低的阶段，难以离开社会集体而孤立的生活。同时，人类离开水和空气也不能活，离开向自然界夺取衣食和资源的生产活动，也不能存在和发展。物质生产是被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所以，人口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正由于此，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的研究，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如：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统计学（多种统计学科）、遗传学、生态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都是有用的，都能推动人口学的发展。人口学既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又是一个各科学相互渗透的综合性的科学群或科学体系。这些有关科学部门，都各有其独特性和独特作用，又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必须互相协作，共同前进。

我是从人口地理学转入人口学的研究的，人口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的重点是从经济上研究人口现象的发展、变化的原因，这不是说，其它有关科学的研究就不重要了，绝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说社会经济现象是研究人口问题的核心呢？

第一，离开社会经济背景，任何人口现象的发展变化原因，就难以彻底分析清楚。比如，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非农业人口很少。当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后，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农业也机械化了，美国农业人口降到占总人口数3%左右；而英国农业人口也降到9%以下，非农业人口达到80%以上。随着工业生产的自动化和农业生产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必然大大减少，而科研人员，服务性行业的人口必然大大增加。科研人员的作用和地位加强了，过去的产业工人这一概念，也将随着发生变化。这都说明人口结构上的变化，来源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源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所以说，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对人口形态的变化来说，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然，在经济条件中，也包括着各种技术条件和人口数量，甚至地理环境的丰瘠，自然资源的多少等方面。

例如，世界民族的混合，混血种已达世界人口八分之一，这说明，追求美好的生活，享受较高的幸福，是人生重要的目的之一。而种族、宗教、语言等因素的不同都是次要的。人民受压迫剥削不能生存时就拼命，就要革命。原始社会的老人，当他不能生产和战斗时，就让他自己摔死，美国中部地区人口减少，不是由于劳动力不足，而是由于生产停滞（《美国现代地理》28页），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多少才算合理？密度多大才算合理？不能从人口本身得到回答，只能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上和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上得到回答。人口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生产水平下，人口增长的快与慢，可以促进或延缓经济的发展。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如何把人口的增长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和提高的大事。因此，我国现在为什么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不是说人口只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了！更不是说2,000年增加到12亿人口就是最合理的数目了（也许暂时控制在11亿可能更好些），而是由于目前中国生产力的水平低、底子薄等原因，和中国这样高的人口出生率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造成的。也说明我们决策的同志已经予见到人口生育急刹车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果放任每年出生2,000万人口，就把国家积累的生产基金和增产的粮食吃光了。那还有什么四个现代化？还有什么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正是考虑到当前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才决定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因此，当前要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鼓励和提倡生一个，对少数兄弟民族和有其它困难者，可以适当照顾，做到合情合理。

人口数量和密度本身，不能说明和决定生产水平的高低，也不能说明人口的生产作用大小，只有人口数量、密度与现代科学技术和交通等条件结合起来时，只有人们有了统一的认识，自觉组织起来时，才能充分发挥其在生产中的作用。美国平均每平方公里20多人，印度每平方公里200多人，按着马克思的说法，美国人口经济密度大于印度人口经济密度，也说明人口数量和密度，离开经济条件就难以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交通运输条件好，劳动力在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大于经济落后和交通不便的国家和地区。

说中国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100人就多了，西北部平均每平方公里5—7人就少了，这也不是绝对的。而只是说，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东部劳动力才相对过剩，西部由于生产力水平更低，所以才感觉不到劳动力奇缺。如果，四个现代化普遍实现，东部劳动力相对过剩现象会逐渐消失，而西北部就会感到劳动力不足。人口数量多少，只能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才能说明问题。

无论那个国家或地区，总是生产力不发展的地区、边缘地区，人口稀少却反而出现人口过剩。而城市工厂多、人口稠密，反而劳动力不足。往往是人口稀少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反而低下，人口稠密的城市工业区，反而生活水平高，物质文化生活优越。

最明显的是中东地区，由于石油的开采，石油化工等工业的发展，劳动力和技术力量感到严重不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国人口二十多万，外籍工人却多到八十万左右，即大于本国人口三、四倍。科威特仅是一个30—40万人口的小国家，外籍工人却大于本国人口一倍多。在这里，人口发展要与生产发展相适应就看得更加清楚了。这就是说：在生产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人口再生产要与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在人民消费水平比前期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人口再生产要与消费资料增长相适应；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口再生产要有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质量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等。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们的教育技术水平，也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充分发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

第三，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正如中国《管子》上所说：“衣食之于人，不可一日违也。”马克思也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

死去，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39—340页）。再通俗地讲，就是一个人如果一天吃不饱，穿不暖，没地方住，就难以参加生产劳动，也难以参加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而且还要生病，影响健康影响生育。所以，经济条件虽然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反转过来，又是人口生存和增长的前提。人类的生产是为了消费的目的，而消费又促进了生产，既促进了物的生产，也促进了人口再生产。

第四，人口总是向生产力水平高的地方集中。生产力水平高，生活优裕，对人口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地方迁移，也是由于谋生比较容易。二者形式相反，本质是一样的。从世界各国移动情况来看，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概括起来，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①人口都是从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迁移。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由肥沃平坦地区逐步向瘠薄、干旱、山丘地区转移。③随着国民经济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他们所以这样迁移的原因，除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在原地无以为生以外，似乎也存在一个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相适应的问题。比如：最近150年来，从欧洲向美洲、澳洲移民达到5000—6000万人。中国向南洋群岛移民达2000万以上（很多人已加入住在国国籍）。中国国内由华北地区移向东北、西北者也有3000—4000万人。这属于第一、二类型。又如，全世界城市人口1800年不过占总人口的5.1%，1950年达到29%，1979年就达到40%。而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人口平均达到70—80%。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1900年全世界只有38个，1970年达844个。全世界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950年的61个增到1975年的181个。而且形成了许多大城市群（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大城市实行控制政策，城市人口也从1949年的5000多万增加到1978年1.1亿。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体系的形成中小城镇有着普遍的发展。这些都属于第三种类型。这些例子都证明，人口总是向生产需要和谋生容易的地方移动。

第五，空间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包括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问题）。地球上的面积是有一定限度的，地球上太阳能的数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科学发展从长远看是无限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从另一方面决定了地球上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容纳人口是有一定限度的，“人口发展必须与生产发展相适应”，从中外经济史上看它是人类社会各历史阶段共同的规律。资本主义和它以前的各社会阶段是盲目的互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和人们认识了这些客观规律，就变成自觉的互相适应。所以，我说计划生育是人类在地球上和宇宙中长存的一种手段。

土地面积的有限性，说到底这是一个生产和经济问题。只是地球是人类在太阳系中的家乡，人必须借这个星球的空间和资源进行生产、维持生活罢了。虽然我们还可以向宇宙发展，但短期内难以离开地球这个立脚点。远大理想是好的，但毕竟不是现实。不过，有的人看不见人类走向宇宙空间的巨大意义，完全取消人类逐渐征服宇宙空间的可能性，也是难以成立的。

我这里所讲的经济背景，不只是说经济条件的要求决定着人口的发展。由于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劳动力是生产的主体，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由人创造的。所以，人口的数量，技术水平，政治觉悟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也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经济虽然决定着政治，而政治反转过来影响经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

提高、也是一句空话。

我这里所说的经济背景，不仅包括生产力，而且也包括分配关系。因为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能否合理分配，对人民的生活水平影响极大。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各有其不同的解决人口问题的重点：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应以进行合理分配为重点，因为他们一般生活水平虽比较高，而不能合理分配。大多数人只能是“富穷”（高水平的穷）。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与合理分配双管齐下。他们的穷是“穷穷”——（低生活水平的穷）。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做到合理分配，则必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正是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较快的提高。它们共同之点就是都要适当的控制人口，虽然控制人口的作用和性质不同。

正由于此，也必须适当地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需要减就减，需要增就增，需要维持生死平衡，就维持生死平衡。

我们是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把人口学主要当作社会科学来研究的。今后，我们要吸取一切有关的自然科学的技术成果，用两条腿走路，比较综合地、全面地研究人口学和人口问题。

先进的人口统计方法确实把人口学的科学性大大提高了一步。我们一定要补上这一方面的缺欠。但是只有综合性、全面性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人口问题的本质。一切人口统计和人口预测都应把经济背景，经济变动，考虑在内。

当然，我不是谈用经济原因可以解释一切意识形态里的问题，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意识形态里的问题，比经济条件，更为复杂。也不能单单用经济来解释人口再生产这一现象，虽然它们都不能和经济背景分开。

我们的人口知识有限，愿向世界上有成就的一切人口学家学习，并愿经常联系和交换意见。我这点不成熟的简单意见，难免挂一漏万，难免疏略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上接第56页）

世纪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奥特斯认为不应当把富裕和权力昌盛错当成一个完整国家的财富。和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一样，他反对极端的不平等和谴责战争。然而，他具有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的一般特点。十八世纪法国的思想家们是以热衷于对历史资料和经验主义的材料进行抽象和逻辑思维为特征的。

虽然没有比批评奥特斯更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很接近马尔萨斯。并且奥特斯还超过了马尔萨斯。他第一次提示出人口适度的思想。但是，正如前边我们所知道的，一般的财产适度包括了社会和政治的因素。看起来奥特斯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似乎不大，但是，一个法国著作家断言，和奥特斯一样有素养和探究问题的马尔萨斯是熟悉奥特斯的观点的。

（彭松建译）